

城归青年乡土适应性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基于多案例的实证分析

沈费伟,叶温馨

(杭州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乡村振兴尤其是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城归青年通过返乡创业就业实现为乡村振兴主体性补位。但这一过程并不必然顺利,可能面临着社会适应困境。从社会适应理论出发,在对现阶段城归青年类型划分与特征呈现的基础上,结合全国各地多个案例,研究发现当前城归青年返乡过程都受到时间长短、文化距离、社会网络、物质环境、职业发展等因素影响,面临着个体适应、关系适应、集体适应以及物质适应的现实困境。解决城归青年乡土不适应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和提升城归青年的适应能力,具体包括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社会网络能力、提升动员资源能力和发挥制度体系能力,从而提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质绩效。

关键词:乡村振兴;城归青年;社会适应;乡土适应;能力建构

中图分类号:B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21)05-0116-09 DOI:10.19925/j.cnki.issn.1674-2338.2021.05.013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评述

在国家数字乡村战略和创新创业政策的驱动下,青年返乡创业的潮流日益高涨。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统计,以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和退役军人等为代表的青年返乡入乡双创人员已达850万,为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提供了强大的“人口红利”,不断为乡村发展主体性补位。^[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强调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支持各类返乡人才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这意味着城归青年^①群体在乡村振兴事业中担负着更为重要的使

命。尽管如此,城归青年在返乡创业过程中仍然具有较高的失败率。熊智伟及其课题组对中部五省份返乡创业失败的农民工与大学生进行调研,数据显示50%以上的返乡创业失败者不能坚持超过3年。而社会关系、项目选择、市场竞争、金融支持是影响这两类人群返乡创业成败的共同原因。^[2]《人民日报》也以“当‘城归’碰上陈规”为题对返乡创业失败群体作专题报道,现阶段城归青年返回到农村故乡普遍会面临没场地、差资金、缺服务等问题。^[3]基于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城归青年在数字乡村战略实施中的主力军角色和主体性地位,我们需要重点研究城归青年

收稿日期:2021-04-18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项课题“十四五时期推进浙江省数字乡村治理研究”(21WZQH22YB)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沈费伟,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乡村治理与政府管理研究;叶温馨,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乡村治理与政府管理研究。

^①本文中的城归青年特指具备城市工作生活经验,并掌握一定知识技术、具有城乡社会网络、有返乡意愿的乡村青年群体。本研究将“返乡青年”与“返乡农民工”也纳入城归青年的研究范畴。

的乡土适应性问题^①,真正实现城归青年在乡村振兴中吸引来、留得住、发展好的目标。

当前学术界关于城归青年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大视角:第一,基于主体性特征的视角。学者们关于城归青年主体性特征的研究主要包括返乡动机、资源禀赋两方面内容。朱红根、康兰媛证明城归青年的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密切相关,以生存为导向的创业绩效优于以成长和价值为导向的创业;^[4]汪三贵等学者的研究指出城归青年返乡需具备相应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社会网络为载体的社会资本具有传递信息、增强自我效能感的功能;^[5]袁方、史清华在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上提出互联网资源对城归青年返乡的积极作用。^[6]第二,基于行为过程的视角。学者们普遍关注城归青年的返乡创业模式、影响因素、遭遇的挑战和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刘志阳、李斌将城归青年的创业模式依据驱动力来源划分为资源驱动型和经验驱动型,认为不同模式有不同业绩;^[7]李强通过推拉理论分析户籍制度对城乡流动人口的影响;^[8]吕程平通过对大学生村官创业经历的研究得出资金、技术、外界支持是创业实践的三要素;^[9]此外,教育、网络设施等公共服务、政策扶持力度也是影响城归青年返乡意愿的重要因素。^[10]第三,基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学者们从结构化理论^[11]、角色理论^[12]、嵌入理论^[13]、创新生态系统理论^[14]等多个视角探讨城归青年个体与乡土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城归青年返乡必然会受到乡土社会环境的影响,表现为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的矛盾过程;^[15]另一方面,城归青年承载“双边”社会网络,在乡土社会中承担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角色,也是对社会结构的再塑造。^[16]

综上所述,现阶段学术界关于城归青年议题的研究已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包含主体特征、返乡机理、返乡困境、解决方案在内的研究框架,亦形成了关注城归青年社会意义的研究范式集合,这些都为本研究的深化拓展奠定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资料。尽管如此,当前有关城归青年议题的研究显然忽视或弱化了社会适应视角,未深刻探究城归青年由政策嵌入到内生融合于乡村社会,并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因果机制层面,即尚未清晰认识并解决城归青年的乡土适应问题。另外,在研究方法方面,目前已有较多研究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城归青年返乡创业就业

状况进行分析,富有统计学意义。例如,罗敏从政策号召、社会责任与个人意愿三个维度对H省1231名返乡青年进行问卷调查,探讨青年返乡逻辑。^[17]又如,林龙飞和陈传波基于全国24省75县区995名返乡创业的抽样调查分析了返乡青年的群体特征。^[18]区别于上述侧重于城归青年群体特征的宏观分析,本研究则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运用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城归青年返乡创业实例对城归青年返乡创业的社会适应现实进行深描,通过生动的个案挖掘城归青年更多的适应性特点。

城归青年为何要适应现代乡村社会?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指出,如果一个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不可避免。只有良好地适应了乡村社会,城归青年在返乡后的工作生活中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为乡村振兴事业提供有力支持。基于此种认知,本研究将重点关注乡村振兴背景下城归青年的乡土适应议题,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首先,在乡村振兴时代城归青年返乡的类型及基本特征是什么?其次,城归青年返乡适应过程中有哪些影响因素与现实困境?最后,如何应对返乡适应过程中的各种困境?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研究的重要思路。

二、社会适应理论:剖析城归青年乡土适应问题的分析框架

(一) 社会适应理论的提出、发展及内涵

社会适应(social adap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斯宾塞提出,是指个体通过发挥潜在能力改变自身观念和行为方式以使个体与社会环境相适应而发展的过程。^[19]以沃德、吉丁斯为代表的进化心理学派超越斯宾塞的有机体适应层面,将心理力量作为个体适应社会的支配因素。^[20]皮亚杰将个体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归纳为同化和调节两方面内容,即个体通过发挥个体认知能

^①对于城归青年的乡土适应性问题,笔者最早于2018年6月开始关注并展开研究,该文于2019年12月完成初稿。沿着该主题的思考,2021年5月笔者指导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蔡欣濛、周孙卿、朱铭洁、陈恺等同学参与的《回归与适应:城归青年乡土社会适应性的挑战与应对——基于全国27省590县(区)2202位城归青年的调查研究》获得了浙江省第十七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力,将外部环境的优势转化成自身发展的势能,并通过调适行为使自身与环境达到平衡的状态。[21]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中将社会适应能力作为社会系统存在、持续及发展的首要条件,使社会适应不仅指代单个个体或群体的适应过程,而将其他相关群体也纳入到社会适应的环境中。[22]英格尔斯则将社会适应纳入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维度,并将社会适应的内涵拓宽到心理、行为等各方面。[23]因此,从社会适应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心理层面,个体通过心理调整能合理应对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二是在行为层面,个体通过与社会环境反复互动获得社会生存的基本准则;三是在能力层面,社会适应指调整个体状态、平衡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统称技能。

综合以上多个层面的考虑,社会适应具备个体建构、网络支撑、群体认同、物质满足的核心内涵。个体建构是指面临社会环境的压力时能够积极调整心态、目标和行为,能为人与社会环境相适应提供根本动力;网络支撑则关注个体在适应环境过程中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能为适应整个社会环境提供认同支撑;群体认同要求个体对所属集体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是个体适应环境的成熟形态;物质满足则指个体对所处社会环境的地理位置、物质资料水平的接受程度,贯穿社会适应过程始终。

(二)城归青年乡土适应的分析框架

将社会适应理论引入城归青年返乡适应议题中,则城归青年返乡社会适应是指城归青年在对乡村社会环境再认知的基础上,充分动员社会资源,形成心理、行为、技能层面与环境相适应的自我建构,最终实现个人和社会协调发展。因此,本研究对城归青年返乡适应问题的探讨将从个体适应层面、关系适应层面、集体适应层面和物质适应层面依次展开。首先,个体适应层面涉及城归青年返乡后能否根据社会环境调整发展目标 and 规划,并在心理和行动方面积极自我动员;其次,关系适应层面主要讨论城归青年返乡后能否成功扮演其在家庭、工作和关系网络中的角色,并得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再次,集体适应层面关注城归青年在返乡后对乡村组织、村庄、国家等所属集体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最后,物质适应层面讨论城归青年是否满足和认同乡村社会的物质条件和所属物理空间。

三、乡村振兴战略驱动的 城归青年类型划分与特征呈现

在乡村振兴以及数字乡村战略驱动下,城归青年返乡工作生活是政策驱动、城乡差距、个人发展意愿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呈现出多样态的返乡形式。本研究根据返乡时间长短、返乡动机、返乡社会适应状况三大变量,将城归青年划分为不同类型,分析其特点与表现。

(一)长期型、中期型和短期型

根据返乡的频率和时间长短,可以将城归青年的返乡划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三种类型。长期返乡型城归青年是指返乡后选择长期留在乡村,不打算再回城工作与生活。选择长期返乡的城归青年大多是由于在乡村内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选择在乡村创业就业;也可能是不适应城市中快节奏的生活,或在城市遭到了政策、观念的歧视而选择返乡。中期返乡型城归青年是指在城市生活工作较长时间后就回乡生活工作一段时间,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交替流动。选择中期返乡型的城归青年大多是在城乡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之间难以做出从一而终的选择。这部分城归青年一方面热衷于城市时尚的生活环境和便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贪恋乡村社会的安宁环境和缓慢步调。短期返乡型城归青年则是指长年在城市工作,节假日等日子会返乡走亲访友,回乡的频率一般较高,但时间较短。

(二)主动型和被动型

根据返乡动机,可以将城归青年划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主动返乡型是指城归青年由本人主观意愿决定返乡,包括保守返乡型、创业返乡型和创新返乡型三种类型。首先,保守返乡型是指城归青年早年流入城市时就已设定最终要回乡的目标,其流入城市的目的是在城市中寻找就业机会,在一段时间内积累资金、技术等资本用以支持回乡后的生活、嫁娶、建房等经济生活行为。其次,创业返乡型是指以创业为返乡目的的返乡行为,其返乡后积极整合个人资源和当地资源,利用政府优惠政策和乡村丰富资源,进行创业活动。创业返乡型能有效整合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当地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乡村现代化建设。最后,创新返乡型是指城归青年携带在城市中积累的经验返乡,利用在城市中学习到的知识技术、新兴理念、先进价值取向

在乡村社会生活,在提高自身在乡村社会的阶层地位的同时,也使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在乡村社会中融合发展,给乡村社会带来新气象。

被动返乡型是指城归青年的返乡决定并非出于本人主观意愿,而是受客观环境影响,不得不出返乡的决定,也包含三种类型:城市政策不利返乡型、城市不适应返乡型、乡村振兴政策驱动型。城市政策不利返乡型是指城归青年由于城市政策对农村户口不合理的区别对待而返乡。户籍制度在为地方政府带来管理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城乡居民之间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地域歧视等困境。^[24]城市不适应返乡型则指城归青年由于某些原因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而被动返乡。迫使其返乡的原因有多种,比如不适应城市生活环境、生活节奏和方式、人际关系等。乡村振兴政策驱动型是指城归青年响应乡村振兴政策而选择返乡,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助力乡村振兴。这类返乡青年一般拥有优越的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回乡后积极创业就业,带动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

(三)包容型、回归型、排斥型和边缘型

根据城归青年返乡后对原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文化等的认同情况,可以分为包容型、回归型、排斥型和边缘型四种返乡类型。其中,包容型城归青年是指城归青年回到乡村后能较好适应乡村文化、工作和生活方式,同时对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文化和经历保持一种正面的态度,能够将城乡文化和生活积极地整合起来。回归型城归青年是指那些因为难以接受城市在生活、文化等方面与乡村社会的巨大差异而选择返乡的青年。他们对乡村有着极高的认同感,可能对乡村建设有极高的热情,但也可能会成为固守乡村社会原有状态的顽固力量。排斥返乡型是指城归青年在返乡后十分怀念城市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工作,排斥乡村社会的文化和生活内容。这部分人群需要通过乡村的现代化发展逐渐改善其对乡村社会的认同。如果激励得当,排斥型城归青年也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有效力量。边缘型城归青年是指城归青年在返乡后对乡村和城市环境均持排斥态度,拒绝与双方的社会网络进行沟通。^[25]边缘型城归青年显著缺乏身份认同与社区认同,在乡村社会中仅有极少社会交往行为,在城市则因政策、工作类型等原因不能享受公平

的社会保障,成为社会心理意义上的城乡“游民”。

综上所述,尽管我们依据返乡时间、返乡动机、返乡社会适应这三个标准,划分了不同的城归青年返乡类型,但这也并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城归青年返乡类型会随着社会环境和返乡条件的变化而相互转化。

四、城归青年乡土适应的影响因素与现实困境

在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建设时代,尽管城归青年有着上述多种类型的划分,但其返乡过程都受到时间长短、文化距离、社会网络、物质环境、职业发展等因素影响,面临着个体适应、关系适应、集体适应以及物质适应的现实困境。

(一)城归青年乡土适应的影响因素

1. 时间长短

城归青年在城市生活的时间跨度对乡土适应有重要影响。乡村与城市在物质条件、价值取向、交往方式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城归青年在城市生活工作的时间越长,对乡村环境就会越陌生,因而返乡后乡土适应难度就越大,需要循序渐进、稳扎稳打。例如,四川成都金堂县的城归青年唐亮采取“生态+家庭”的农业形式,成功经营了“成都爱佳源·亮亮家庭农场”,将个人对家庭团聚的愿望与社会性的创业活动相结合,成为当地的创业典型。唐亮在对环境不熟悉之前并未直接发展技术成熟、高成本、大规模的优势模式——CSA(社区支持型农业)蔬菜宅配,而是选择用一年的时间摸索符合当地环境的经营方式,后续逐渐发展农场。农场第一年的经营收入略微亏损外,经过后期调试,第二年就有了10万元的盈余,并随着唐亮对市场的熟悉,之后每年的盈余都稳定保持在12万元的水平。可见,时间是城归青年返乡后资源投入的基本影响因素,一定的时间投入是城归青年返乡社会适应的必要成本。

2. 文化距离

城乡地区的文化距离是指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社会文化、价值偏好、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程度,这极大地影响着城归青年的乡土适应性程度。例如,赣南宋村的城归青年宋海在村里销售摩托车,平时生意不错。但和城市里讲求钱货两讫的商业文化不同,村民们更看重人情关系,在店内赊账或讨价还价,给宋海的店面经营带来极

大负担,最终面临倒闭的威胁。究其原因,城市讲求“契约精神”的规则体系在乡村环境运行时遭遇“熟人关系”的冲击,无法获得普遍认同。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社会资本的获取需要适应一个共同体的道德准则,并且在这一共同体情境中培养各种美德”,“换句话说,每个人各自行事是无法产生社会资本的。它基于社会美德的普及,而非个人美德。”[26](P.41)综合而言,乡村社会对多样化文化的认同度会影响城归青年的乡土适应性,其认同度越高,文化差异对城归青年社会适应过程的影响就会相对越小。

3. 社会网络

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将民间参与网络及其中的互惠和信任规范定义为重要的社会资本,认为其数量和质量对社会发展和公民福祉有重要意义。[27]例如,宁夏盐池县的城归青年冯欢通过技术入股家乡的宁鑫生态牧场饲养滩羊,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社会网络有效结合,极大地提升了创业的绩效。2015年以前,单只滩羊的利润几乎为零;2015年以后冯欢通过成立合作社,吸纳多元的社会资本力量,从而成立了产业化联合体,使得一只滩羊的利润可达到100元。另外,随着新兴冷链科技的运用,单只滩羊的利润如今已达上千元,约为刚成立合作社后的40倍。宁鑫生态牧场真正将社会网络资源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通过将城市关系网络中的经济技术优势与乡村关系网络中的经验人力优势相结合,搭建滩羊养殖平台、培训养殖技术、宣传养殖理念,推动宁夏滩羊养殖产业不断提质升级,带领家乡人民走上致富路。

4. 物质环境

优化乡村社会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教育等公共服务质量,对增强城归青年乡土适应性有积极作用。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城归青年返乡意愿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近2000名调查对象中,有62.6%的城归青年认为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对返乡意愿影响较大。[28]可以说,城归青年在习惯了城市相对优越的住房条件和公共设施后,能否坦然接受乡村的生活工作环境,顺利回归乡村朴素简单的生活,是城归青年乡土适应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以重庆市梁平区扈槽村为例,在“二环路”修进村之前,扈槽村是一个经济落后、人口外流的传统乡村。直到“二环路”开通之后,城归青年们才纷纷进村

从事民宿经营、电商运作、广告宣传等工作,将乡村的自然风光和绿色产品变现为个人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资源。由此可见,交通、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与物质条件是打开城归青年返乡大门的钥匙,物质环境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城归青年返乡创业就业。

5. 职业发展

职业发展是城归青年利用所获资本实现人生价值的必要途径,包括进入现有乡村企业就业、基于当地丰富物产文化资源基础进行创业、进入村两委的行政岗位发展等。城归青年在返乡过程中是否具有符合个人追求与社会价值的职业发展机会,是城归青年返乡的重要关切。例如,青海的城归青年索南才通过销售家乡的枸杞、冬虫夏草等天然药材,每年可获利千万元;贵州纳雍县的城归青年李俊利用所学技术,向家乡村民们传授养羊技术,集体致富;河南省陶山村的第一书记王中旗、山西省佛堂村第一书记张丽等有为青年放弃城市中的舒适生活,毅然奋战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正如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所言,注重贡献的人在行动时会关注整体绩效而不仅是个人在某个领域内的成功。[29]在乡村振兴时期,许多城归青年的职业发展已将个人发展与乡村进步相结合,通过返乡工作带动乡村经济快速发展。

(二) 城归青年乡土适应的现实困境

1. 个体适应层面的困境

个体社会适应所呈现的是一种广泛的自我认同,该层面的困境包括目标、价值观、信念、精神追求、决策的标准以及对未来的自我期待等方面的问题。首先,城归青年由城市返回乡村,必然面临价值观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容易陷入迷茫与决策困境,自我发展愿望被抑制。其次,城归青年能否有效融入乡村社会环境,取得乡村集体的普遍认同,对城归青年个体的自尊和自我评价有重要影响。一般而言,积极的集体生活势必给城归青年个体带来积极的自尊感受,而低自尊或自尊受到威胁甚至会带来群体间的歧视结果。[30]例如,四川巴中市恩阳区群乐镇的马宗平是当地的脱贫榜样,他经营的宗平种养殖场目前有500多亩的土地规模,为当地10余名贫困户提供就业机会。但他的创业历程也十分坎坷,由于自己的信息技术短板和不成熟的养殖技术,他曾两次创业失败,甚至从小康家庭变成了“贫困

户”，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舆论压力，一度自我怀疑、放弃创业。但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他重塑自我认同信念、积极创业最终成功脱贫，并且成为种植大户，实现了自我期望。

2. 关系适应层面的困境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体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可见，构建社会网络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城归青年本身的城乡双重社会属性，其关系适应层面必然也面临着建构与调试城乡社会关系网络的双重困境。首先，关系建构方面涉及乡村社会网络建构与城市关系网络维持。在乡村关系建构方面，城归青年与村民们尽管有“集体记忆”的牵绊，但存在社会网络“陌生化”的现象，表现为在知识水平、生活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上都存在一定差别，这给城归青年构建乡村社会网络带来难度。在城市关系建构方面，城归青年返乡后在地理空间上远离了其处于城市的社会网络，城市社会网络共振的频率和质量也会发生变化。其次，如何维持乡村和城市社会网络的弹性以发挥城乡社会网络的资源与信息优势，助力城归青年返乡事业成为第二个难题。以湖北省丹江口市的城归青年李杰为例，李杰在返乡进行互联网行业创业后的整整一年都在适应小县城的“经济规则”，培养“酒桌人情”，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网络。但他长期与城市方面疏于联系，未将城乡两张社会网络有效结合，最后错过了VR技术、短视频等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导致创业失败。

3. 集体适应层面的困境

城归青年如何塑造乡村价值的整体认知与归属认同是其乡土适应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这些困境至少包括：城归青年能否认同乡村社会的文化和价值取向，能否真正融入乡村社会群体并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等。^[32]首先，在文化价值层面，城乡文化之间存在现代与传统、开放与保守、进步与落后的张力，城归青年能否放下“城归”的“包袱”，用包容接纳的心态辩证看待乡村的文化和价值取向，虚心向村民学习，是其适应乡村的关键。其次，在角色功能层面，城归青年能否为乡村社会带来发展方面的价值对其乡土适应问题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不能运用自身能力给乡村带来诸如带动就业、提高村民收入等实质性发展的城归青年无法顺利得到集体的认同。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文星镇三井头社区的

大学生村官何曦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博士，毕业后选择返乡从事基层工作。然而，由于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在社区进行棚户区改造的居民动员工作中无法找准入手点，收效甚微，未能获得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的认同。由此可见，社会角色的产生来自社会需要，个体存在满足社会需要是城归青年融入集体、实现社会价值的关键。

4. 物质适应层面的困境

物质适应问题是城归青年乡土适应过程中遇到的最具现实性的困境，具体表现为：物理环境的不适应和心理状态的不适应。首先，在物理环境方面，尽管现阶段乡村生态环境一般优于城市，但基础设施、教育服务、文化设施等方面条件落后是客观事实。城归青年习惯了基础设施完善、社会服务优质的城市生活后，一时间难以习惯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乡村生活。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城归青年，迫切希望乡村物质环境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例如，陕西清涧四合队村城归书记马旭升在扶贫工作中深刻体会到山道失修、用电紧张、房屋破旧给村民衣食住行带来的不便。他期望在任期间，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为村民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其次，在心理状况方面，城归青年容易受城乡之间物质消费、福利待遇方面较大差距的影响而导致心理失衡。这种由消费带来的价值观念动摇着城归青年扎根乡村的信念。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城归青年返乡意愿的调查中，来自河北的受访者祁佳表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家乡的生活成本已然不低，但工资尚未提高到合适的水平，这成为城归青年返乡的最大顾虑。

五、城归青年乡土适应的能力建构与应对策略

社会适应问题的实质是人与环境的有效互动、共同发展，解决城归青年乡土不适应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和提升城归青年的适应能力。基于此，结合上述对城归青年返乡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和面临的现实困境，我们可以从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社会网络能力、提升动员资源能力和发挥制度体系能力四个方面提出应对策略，从而更好地提升数字乡村和乡村振兴的建设绩效。

（一）个体适应层面：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自我发展能力是个体在适应环境、追求自我发展过程中所必需的知识、心理和行为方面的能力。为了更好地适应乡土社会，城归青年至少需

要从增强自我学习能力、提升行动规划能力以及促进适应环境能力三个方面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首先是增强自我学习能力。社会适应理论要求个体具备熟悉环境且具有符合环境要求的能力。因此,城归青年要坚持不断学习、储备知识,了解当地的风俗文化、关系网络和产业资源,学习乡村生活与工作技能,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寻求、决定和发展多种“事业”。其次是提升行动规划能力。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生活规划是以反身性方式形成的自我发展轨迹之实质内容”,“以反身性方式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构建既依赖于为未来做好准备,也依赖于过去做好解释。”[33](P.79)由此可见,制定明确的行动目标是个人发展的关键要素。城归青年应明确返乡目标,并制定阶段性的行动规划,保证返乡创业就业顺利进行。最后是促进适应环境能力。在社会适应过程中,城归青年需要积极采取行动,使个体目标与社会环境密切联系,将自身拥有的资源以符合乡村环境要求的方式转化为创业就业的生产力,从而在推进乡村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二)关系适应层面:建构社会网络能力

人的社会化体现为在社会生活中担当一定的角色,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34]因此,个人能否真正适应社会环境,关键在于能否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社会网络,成功扮演自己在家庭、工作和生活关系网络中的角色。这要求个人至少具备构建和谐家庭关系、发展良好工作关系、培育友好生活关系三方面的能力。一是构建和谐家庭关系的能力。家庭是联系个人与社会的中介,是城归青年适应乡村社会环境的基点。面对返乡后陌生环境带来的各种挑战,城归青年应与家庭成员深入沟通,在相互支持与妥协中达成发展共识,以和谐的家庭关系为自己提供动力支持和缓冲压力的空间。二是发展良好工作关系的能力。构建工作关系网络的关键在于将具有共同目标或利益相关的人与组织联系在一起,为城归青年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主要平台。这要求城归青年识别个人与组织的价值目标,以共同利益为关系节点编织涵盖多个方面、多种层次的发展性工作关系网络。三是培育友好生活网络的能力。生活关系是包括文化传统、习惯偏好、角色分工在内的社会环境。城归青年应加强对乡土生活的融入程度,通过走家串户、积极参与

集体活动、共享集体文化来培育友好的生活关系网络,从而为返乡工作与生活营造稳定积极的环境,最终实现个人与家庭在乡村社会中的稳定落户。

(三)集体适应层面:提升动员资源能力

Johannes Fedderke 等学者指出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生产要素,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社会资本的形式与配置有不同要求。[35]因此,城归青年应提升资源动员能力,将个人目标的实现与乡村社会组织、村庄、乡镇等集体的发展相结合,有效整合个体资源与集体资源,将其变现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生产力。首先,增强动员市场资源能力。城归青年在乡土适应过程中应充分挖掘当地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配备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持,在充分获取市场信息的基础上发展创业就业能力。其次,提升运用政府资源能力。地方政府为城归青年更好地适应乡土社会创业就业提供了融资、行政事务办理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城归青年可以通过运用相关政策指导创业实践、规范创业行为、学习经验技能,从而降低返乡创业就业成本。最后,强化动员社会组织资源能力。组织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因此城归青年在乡土适应过程中需要获得当地乡村社会组织、村庄集体的认同与支持。[36]通过对市场、政府、组织层面的资源的调动,城归青年掌握了返乡创业实践的主动权,有利于最终发展目标的实现,最终获得集体层面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四)物质适应层面:发挥制度体系能力

物质既是一种生活层次,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水平,也是一种符号,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个体的价值偏好、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物质层面的社会适应需要注重发挥制度体系能力,提升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经济收入三个方面的适应程度。首先是发挥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优化发展平台。政府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制度供给力度,切实提升乡村地区的交通、水电、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为城归青年的乡土适应提供生活与工作的基础性条件。同时,还应该发挥政府制度优势帮助城归青年运用新兴技术谋求乡村振兴发展。其次,发挥社会保障提质能力,搭建安全环境。在完善城归青年返乡创业政策的同时,注重完善相关城归青年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城归青年实现乡土社会物质适应问题的重要抓手。返乡创业

对城归青年有较大风险,只有完善医疗、就业等方面的保障,城归青年才能全心投入返乡创业实践,为乡村振兴献出自己的力量。最后,发挥经济收入提档能力,增强物质支持。城乡社会的收入差距是城归青年难以在乡村社会适应并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归青年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以此提高城归青年的工资收入水平,优化其生活环境,扩展其发展空间,从而达到“留住”城归青年、维持乡村发展活力的目的。

六、结论与讨论

社会适应是个体应对环境变化的心理和行为为调试,是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发挥功能、实现价值的前提。当前城归青年通过返乡创业就业对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普遍面临着个体调试、关系建构、集体归属、物质条件方面的社会适应难题。基于此种认知,本文从社会适应理论出发,将城归青年按照返乡时间长短、返乡动机、返乡后对原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文化等的认同情况,划分为长期型、中期型和短期型城归青年,主动型和被动型城归青年,包容型、回归型、排斥型和边缘型城归青年,其返乡过程都受到时间长短、文化距离、社会网络、物质环境、职业发展等因素影响,面临着个体适应、关系适应、集体适应以及物质适应的现实困境,因此需要构建和提升城归青年的适应能力,以更好地促进乡村社会发展。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尽管为当前城归青年与乡村振兴议题研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社会适应视角,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研究不足:一是研究主体侧重于城归青年,而没有将城归青年子女、城归老人等主体纳入到“城归”的研究范围,也即是说只展现了城归青年主体的乡土适应情况;二是研究的方法侧重于质性研究,没有对城归青年在个人适应、关系适应、集体适应以及物质适应方面给出量化的数据分析。因此,未来有关城归青年的乡土适应议题的研究可以从拓展主体、数据模型、定量研究等方向进一步展开,从而更高层次地关切城归青年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主体“归位”状况,提升数字乡村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质绩效。

参考文献:

- [1] 刘祖云、姜妹:《“城归”:乡村振兴中“人的回归”》,《农业经济问题》,2019年第7期。
- [2] 熊智伟:《返乡农民工创业失败影响因素比较研究——基于我国中部5省微观调查数据》,《调研世界》,2018年第7期。
- [3] 孙振:《当“城归”碰上陈规(微调查)》,《人民日报》,2017年3月26日。
- [4] 朱红根、康兰媛:《农民工创业动机及对创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15个县市的438个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 [5] 汪三贵、刘湘琳、史识洁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农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12期。
- [6] 袁方、史清华:《从返乡到创业——互联网接入对农民工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南方经济》,2019年第10期。
- [7] 刘志阳、李斌:《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基于“千村调查”的证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 [8]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 [9] 吕程平:《支持力量、技术选择与创业周期:大学生村官创业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6期。
- [10] 沈费伟、刘祖云:《精英培育、秩序重构与乡村复兴》,《人文杂志》,2017年第3期。
- [11] 黄建新:《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研究——结构化理论的视角》,《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 [12] 李胜蓝、江立华:《基于角色理论的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实践困境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 [13] 赵祥云:《嵌入性视角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适应性调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 [14] 杨秀丽:《乡村振兴战略下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构建》,《经济体制改革》,2019年第4期。
- [15] 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学术探索》,2007年第3期。
- [16] 朱力、赵璐璐、邬金刚:《“半主动性适应”与“建构型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模型》,《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 [17] 罗敏:《从“离乡”到“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基于H省Z市1231名青年的问卷调查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9期。
- [18] 林龙飞、陈传波:《返乡创业青年的特征分析及政策支持构建——基于全国24省75县区995名返乡创业者的实地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9期。
- [19] 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张雄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 [20]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 [21]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 [22]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第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
- [23] 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

- 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 [24] 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 [25]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 [26] 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 [27]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 [28] 孙山:《促进返乡就业 62.6%受访青年建议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青年报》,2019年8月1日。
- [29] 德鲁克:《个人的管理》(第2版),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 [30] 沈费伟、蔡欣濛、林欣等:《城归青年的乡土社会适应性问题研究:进路与反思》,《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 [3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 [32] 丁水木、张绪山:《社会角色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 [33]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 [34] 奚从清:《角色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 [35] Johannes Fedderke, Raphael De Kadt, John Luiz,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apital: a Critical Reflection”, *Theory and Society*, 28(5), 1999.
- [36] 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Return and Adaptation: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Adaptation of the Returned Rural Youth: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Multiple Cases

SHEN Fei-wei, YE Wen-x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specially the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the returned rural youth make up the mainsta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returning home and starting employment. But this process is not necessarily smooth and may face social adaptation challenges. The theory of social adaptation provides constructive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of home-coming rural youths.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turned rural youths at this stag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returned rural youth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by combining multiple cases across the country. It is discovered in the study that the return of returned rural youths is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length of time, cultural distance, social networks, material environment and career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homecoming is also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individual adaptation, relationship adaptation, collective adaptation, and material adaptation. In fact, solving the problem of rural unfitness of home-coming rural youth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mproving the substantive performanc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key lies in building and improving the adaptive ability of returned rural youths, including the abilities to enhance self-development, to build social networks, to mobilize resourc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system.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turned rural youth; social adaptation; local adaptation; capacity construction